突破道德评价引领一切的史观　超越传统看待大变局下的人物

天朝

聂作平 著

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

第一部以剖析时代精英之恨分析大清之死的著作
第一次提出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793年而非1840年
第一回将中西文明交锋作为大清灭亡的根本原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朝1793～1901 : 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 / 聂作平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2.1
ISBN 978-7-5057-2983-4

Ⅰ. ①天… Ⅱ. ①聂…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1793～1901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1793～1901 Ⅳ. ①K249.07②K82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8229号

书名　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
作者　聂作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690×980毫米　16开
　　16.5印张　213千字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983-4
定价　2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自序

2009年春天，为了给《中国国家地理》采写一篇关于福建港口的长文，我在福建沿海走马观花地跑了一圈。我发现，在中国，负山面海的福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漫长的年代里，起伏的群山将它和中原隔绝，而浩瀚的海洋又让它的子民止步于汹涌澎湃的蔚蓝。但是，当历史翻到近代，它忽然又因那片海洋而成为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在福州，我寻找林则徐墓、严复墓，探访沈葆桢故居、马尾海战遗址。其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在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在这突如其来的巨变面前的种种反应与作为，无论是盲目排外还是惧洋媚外，无论是关上大门还是敞开门户，直到今天，仍然能让我们从中读出无限感慨和启示。

对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来说，它的臣民们在巨变中的体验无疑是痛苦的、疑虑丛生的：他们对西方列国所知甚少，因为“天朝”从来都自命为世界的中心，理应四方来朝，万国入贺，他们却鲜有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习惯。这种所知甚少导致了巨变前的傲慢自负和巨变中的彷徨无助。身处这巨变年代的有识者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他们所遭逢的时代如此天翻地覆，而考察那些身份与地位殊异，仅因生存时空交汇而有着共同命运的大清子民——封疆大吏也好，平头百姓也罢，都被那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赋予一个寓意深长的符号：“杂种”——混合了东西方文明的“杂种”。

在这种思考中，我开始细心体味和把握我注意到的那些早已尸骨无存的人。他们何其不幸，生在那样一个变革动荡的时代，两种文明在他们的世界角力交锋。他们可能措手不及，可能被全新的观念和全新的技术打得昏头转向：诸如叶名琛，诸如张荫桓，诸如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他们又何其幸运，在两种文明最初的交锋中，有了比先人更多的道路可供选择，有了更为广阔的生存方式舒展性灵：诸如王韬，诸如严复。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教科书上确认的1840年，标志事件也不是鸦片战争，而是1793年，标志事件则是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意味着中国和西方的真正接触，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从此开始。原本封闭并享受这种封闭的天朝，终于不得不在一次次打击之下放低身段。以往，天朝以为世界上的国家虽然众多，但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天朝，另一个是其他国家；而现在，它不得不承认，天朝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天朝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谁天然地比谁更优越更高贵。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不甘的，但必须经历这种痛苦和不甘，中国才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其实就是中国被迫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这个进程如此漫长而艰辛，几代人在丧权辱国的噩梦中苦苦挣扎。

这部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所涉及的时间，上为1793年，下为1901年。前者是马戛尔尼来华，西方世界主动向东方中国递出橄榄枝；后者为义和团运动，一次精英与草根合谋的大规模的排外与仇杀。后者同时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尽管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代人为了融入国际社会或者说为了追赶西方，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维新变法等史无前例的阵痛，但一百多年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多大的进展和改观。这说明，历史的发展常常不是笔直向前的，而是有着若干的迂回与后退。

我关心的其实不是那些历史事件，毕竟它们早已广为人知。我关心的是处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人，他们的悲欢，他们的得失，他们的顺从与抗争、阴暗或明媚。在阅读我所关注的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文字，并试图走近他们的心路历程时，我能感觉得到，当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在面前展开之时，他们的命运必将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加丰富，也更加艰难。这种既丰富又艰难的命运，将使他们的人生充满意想不到的起承转合。换言之，生存于1793－

1901这个漫长而艰辛时期的中国人，不论对浩荡的世界潮流采取何种态度与姿势，都将因时代的波诡云谲而有了足够精彩抑或足够黯淡的人生。

这一系列历史随笔的写作长达两年多。跨度长的写作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而思考越多，或许，越能让我准确地切中那个远去时代的脉搏。在写作此书之时，我也萌生了另一个念头：要写一部比砖头更厚的中国近代史。因为，我想用我的方式阐释历史，阐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您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只是个开始。路还在远方，像历史一样漫长。

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和读者所了解的常识迥异。对此，我真诚地希望，如果它们是错误的甚至荒谬的，我愿意接受每一位读者理性的批评。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对我的观点文责自负。

目录

自序 /1

第一章 …… *1*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眼里的天朝

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要等上半个多世纪，天朝还要继续沉浸在盛世的虚假繁荣中，但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过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场和更为开放的政策时，随着势力与欲望的增加，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章 …… *19*

来自高级官员张集馨的报告

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几乎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肓。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

第三章 …… *37*

从龚自珍的诗文看天朝没落

他生活在封建大厦行将倒塌的前夜，这位敏感而疏狂的诗人，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多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骚乱已经拉开帷幕。龚自珍的痛哭和癫狂，隐含着他对那个不可救药的时代的绝望，但内心深处，他依然热爱着腐朽的王朝和王朝治下的神州。

第四章 …… *57*

林则徐与严复：英雄的真相

或许，我们可以断言：林则徐是个历史人物，他的思想和行动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严复不仅是个历史人物，还是个未来人物，也就是说，严复的思想和行动——更多的当然是思想，既影响过他的时代，还影响过他身后的世界。

第五章 …… *69*

叶名琛，从总督到罪人的宿命

叶名琛的误国，被时人讥为“六不总督”，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是也。其实，叶名琛战也好，和也罢，守也好，走也罢，都不足以改变他的宿命。是这个古老而僵化的帝国积重难返的观念导致了叶名琛成为宿命的奴隶。

第六章 …… *83*

第一留学生容闳和他夭折的强国梦

先驱总是因不合时宜而被当做笑柄——不是先驱曾经的理想已经实现，而是这理想已经无人延续。我们可能有着一个半世纪前的种种困境与危机，却没有一个半世纪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容闳这样的先驱。在没有先驱的时代，漠视甚至蔑视先驱就成为凡夫俗子的原罪。

第七章 …… *99*

留美幼童：祖国亲生的“杂种”

是大清自己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祖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第八章 …… *113*

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孤独之旅

一个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一步，他是优秀人才；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两步，他是不世出的哲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三步，却可能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呆子和笑柄。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时局、外交和西方列国本质的深刻洞悉，郭嵩焘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何止三步。

第九章 …… *139*

报界第一人王韬的生存方式

当所有古老的大门都朝他关闭，他只能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正是开放的口岸给了他这种可能。他的一生得感谢跨海而来的洋人，是他们为他提供了新生活与新思想，尽管这种新生活与新思想在飞翔了几十年之后，还得重新坠回陈旧而腐朽的中国大地。

第十章 …… *173*

光绪重臣张荫桓之乱世功名

在这部翔实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弱国外交官的种种遭遇：既有对华人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怒，也有对西方社会习俗的惊讶和逐渐习惯，更多的，或者说更有意义的则在于，他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相当精辟的分析。

第十一章 …… *187*

公祭政治犯刘光第的幕后玄机

自古以来，忠臣蒙难都是最能引发人们同情之泪的。在传统戏文里，人们早就对忠臣蒙难的故事耳熟能详。如果说，忠君爱国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是每一个故乡的平民百姓都能理解并被感动的话，那么刘光第对家乡的热忱则给予过他们见得着的温暖。

第十二章 …… *199*

“义民” 义和团VS“汉奸”李鸿章

义和团乃是一场被清政府高层利用的运动，是器，是工具。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可以说，它加速了大清王朝覆灭的进程，也让遭逢此劫的芸芸众生苦痛悲怆。

主要参考书目 ／ *250*

第一章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眼里的天朝

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要等上半个多世纪，天朝还要继续沉浸在盛世的虚假繁荣中，但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过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场和更为开放的政策时，随着势力与欲望的增加，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我努力克制这种神奇而又令我沮丧——可能也令所有中国人沮丧——的联想，但思维总会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千多年前那则著名的寓言：黔之驴。在这场现实版的驴与虎的博弈中，中国充当了那头愚蠢的庞然大物，而人口与历史均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英国，则充当了狡黠而又隐忍的老虎。在从“懋懋然，莫相知”到“大骇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断定“技止此耳”而“断其喉，尽其肉”的不断深入中，最初把驴子视为神的老虎，终于获得了饱餐的机会。

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对中国最早的了解，来自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们的转述。在这些夸张的东方传说中，西方最早的中国形象近似于哈哈镜中的反射：通过这面神奇的镜子，东方的没落与专制缩小了，光辉与仁厚放大了。这个盛产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广大国度，得天独厚地沐浴着圣人的教化。伏尔泰为此断言：从道德层面上，西方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学习。莱布尼茨则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伏尔泰和莱布尼茨都没见过的这个开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任皇帝：乾隆。但是，当东西方真正近距离接触后，雾里看花般的美好想象顿时被残酷的现实之手撕得粉碎。而东方中国的真相之幕，则由一个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绅士揭开。

1793年9月14日，当这个英国绅士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位于北京一百多英里外的热河行宫，见到了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那是

一个秋意深浓的早晨，这个英国孩子在一群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在黑暗中行走了四公里后，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行宫。这是一顶黄色的大帐篷，周围如众星拱月般拥挤着无数小帐篷。英国孩子进入帐篷时，看到一个精神矍烁，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人端坐在龙椅上。按照此前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才达成的协议，一个英国绅士向乾隆单腿下跪行礼。礼毕，英国绅士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呈给了乾隆。之后，这个孩子随同他的父亲也跟着上前行礼。当乾隆听说这个满头卷发的小洋人居然会说汉语，兴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说几句。于是，小洋人就用一年来在前往中国途中学会的汉语向乾隆表达了祝福和感谢。这个小洋人，就是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礼的英国绅士，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

接见之后的日子，作为英王特使的马戛尔尼以为他的外交使命才刚刚开始。当他正准备就若干重要事务和天朝官员商讨时，天朝却一再暗示：你的朝贡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返回你们的国家了。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尽管聪慧过人，但想必不一定会对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有很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后，当他长大成人，才会明白这场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的失败外交会对地球东西端的两个大国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

在天朝，擅自学习汉语是死罪

我们今天常说清朝闭关锁国，并把晚近中国的落后归之于这种漫长的固步自封。但事实上，清朝将近三百年间，真正闭关锁国的时间只有区区二十一年，还不到这个王朝历史的十分之一。并且，这种闭关锁国从现实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正确选择：明朝灭亡后，唯有台湾郑氏

凭借风急浪高的海峡继续奉朱明正朔，不断派兵骚扰沿海。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绝所有口岸的对外贸易，并将沿海居民内撤30–50里。1683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政府取消了海禁。两年后，又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地开设海关，这就是所谓的四口通商。

清朝二十一年的闭关锁国，却给后人留下了长期与世隔绝的坏印象。究其因，不在于海禁政策施行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清朝君臣固有的观念里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简单地讲，清朝——无论君王还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自认为物产丰富的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和夷人做生意通有无。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许通商，不过是对夷人的恭顺赐予的“恩惠”。也就是说，当天朝觉得夷人不够恭顺，可以随时取消这种“恩惠”。就像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一个成员在他的游记里写过的那样：“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在四口通商维持了七十多年后，正是恼怒于夷人的不够恭顺，清朝才从实质上断绝了宁波、厦门和上海的贸易，仅仅开放广州，实行一口通商。

这件事得从一个叫洪任辉的英国人说起。洪任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此人精通汉语，是英国第一个汉语翻译，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当时，西方与清朝的主要贸易地是广州，而广州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职权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诈勒索。东印度公司不胜其扰，同时也为了扩大与清朝的贸易，指派洪任辉和喀喇生带两支商船北上定海。随后，英国方面把更多的商船发往宁波等地。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便急剧减少，广州官员的灰色银两与海关税收均呈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向乾隆提请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迫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

对帝国税收来说，无论洋商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样。但乾隆不这样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

扩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广州这个地方，保有一个帝国与夷人之间的窗口，既以此彰显天朝对恭顺熟番的关照和恩赐，也方便宫中进购自鸣钟、八音鼓之类的西洋新玩意儿。

果然，宁波的关税很快就比广州高出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辉北上。这个说得一口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因缘际会地成了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

洪任辉到达天津后，通过向官员行贿，将一纸诉状送达乾隆御前。状纸中，洪任辉指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官员敲诈勒索，作为洋商代理机构的洋行故意拖欠货款，希望天朝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乾隆看完状纸，龙颜大怒——皇上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定的官员们假公济私，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况且，这个夷人对天朝恩赐的贸易机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有辱天朝体面。

独裁者愤怒的后果很严重：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在大牢里蹲了3年，那个胆敢给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刘怀，被斩首示众。在乾隆亲自给洪任辉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是：擅自学习汉语。

学习汉语竟然是一种罪行，在今天各个国家都努力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字，以期增进了解的背景下，这简直匪夷所思。后来，当斯当东一行前往中国，他们物色到两个在意大利学习的中国神父，并聘两人为翻译。但当使团抵达中国后，其中一个神父即胆怯退出——他一定知道刘怀的前车之覆。另一个神父之所以敢留下来，仅仅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完全无法理解，但当时的朝廷理直气壮：夷人一旦会说汉语或国人一旦会说夷语，他们就有可能互相勾结，图谋不轨。这种简单的推理，类似于只要有鸡巴就必定是强奸犯。多年以来，却少有人质疑其荒诞与不经——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不是也有

许多会说外语的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洪任辉豪气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状，不仅没能解决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贡贸易体制下清朝官员对洋商的巧取豪夺，反而因激怒了乾隆而被监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规定广州是向洋商开放的唯一口岸。从此，广州就成为帝国这间铁屋上硕果仅存的一个巴掌大的窗口，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时期，才有更多的窗口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次第洞开。

作为对洪任辉擅自告状和居然懂得汉语的惩罚，朝廷在确定一口通商国策的同时，还对洋商作了诸多被西方人认为令人发指的规定。比如在广州的洋商，春节必须撤到澳门，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来；洋商的女性眷属，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在广州的洋商，其起居行动，仅限于划定的十三行区域；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也成为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教科书曾经一再教育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乃是在中国自命天朝上国的前提下对西方的种种苛求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不平等。

聋子与聋子的对话

2009年11月，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枚玉质的印章拍出了三百一十五万英磅的天价。这枚印章的主人正是统治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乾隆，印章制作于他八十岁生日前夕。两百多年前，马戛尔尼率领那支达七百多人的使团前往中国，公开的理由就是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乾隆补祝八十大寿。

晚年的乾隆是一个喜欢热闹的虚荣老人，不仅自命十全武功，也是世界上创作诗歌最多的人——他一生的诗作近四万首，堪比《全唐诗》数目。对追慕虚荣的君王来讲，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夷，竟然也历尽艰辛前来为他祝寿，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证明自己的德政泽被天下的吗？万国来朝向来就是中国帝王们最好的一口，乾隆在这方面尤其有瘾。当英国方面通过商人向清朝传递出将派使团前往北京的信息，乾隆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吩咐使团经停沿线的官员一定好生接待。

乾隆和他手下的官员们自然无法也无暇知道，祝寿只是一个幌子，洋人的真实面目掩藏在天朝自我制造的所谓英夷入贡的烟雾之后。

马戛尔尼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建立中英双边的高层直接对话。直接对话则是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方面一相情愿地希望，能通过马戛尔尼的这次出使，说服天朝同意在沿海划定一两块土地，供他们作商业基地；同时，清除广州一口通商的种种弊端；双方互派全权大使，处理两国之间的诸种事宜。

英国朝野对马戛尔尼这位老牌政治家的出使充满期待，虽然关于中国官员敲诈勒索的各种传说时有耳闻，但更多的英国人依然相信，古老的东方将会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地球上唯一的日不落帝国。为了向中国皇帝示好，也为了显示大英帝国是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伟大国家，马戛尔尼使团为乾隆备下了一份丰厚的、最能展示当时科技水平的礼品，这些礼品包括：天像仪、地球仪、天文钟、望远镜、机械工具、玻璃制品、测量仪、最新式的火炮和英国最凶猛的战舰的模型，以及精美的四轮马车。

这次从西方到东方的旅行漫长而充满风险。托马斯·斯当东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之所以能成为使团正式成员，在于他的父亲乔治博士是马戛尔尼的副手。这样，斯当东就以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身份赶上了东方与西方的第一次对话。

1792年9月26日，使团的三艘舰船驶出了英国朴茨茅斯港，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此后，他们沿着中国东部海岸北上。当他们抵达北京时，乾隆正在他的夏宫热河避暑，使团被安排住在了著名的圆明园。五天后，使团动身前往热河。到正式见到乾隆时，距马戛尔尼一行离开家乡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年的旅途中，斯当东最大的乐趣就是向神父学习汉语。一年的学习，他已熟练地掌握了汉语——不仅是对话，还包括用毛笔书写。正是这次长途跋涉中的意外收获，确定了斯当东以后的人生方向：他的一生，都将和中国打交道。他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学家，同时也将成为第一位把大清法律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

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快就嗅到了马戛尔尼与以往那些来自安南、朝鲜、缅甸、琉球等国使者们迥然不同的气息。这气息令他极度不爽——马戛尔尼居然荒唐地拒绝向天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从一开始，马戛尔尼就知道他将面对一个有着古怪思维的国度，打算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比如，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在他坐的船上张挂写有“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他假装没看懂。但是，一旦清朝官员从暗示到直接说出必须向乾隆行大礼的要求，他意识到这是事关国家尊严的事情，便坚决地予以拒绝。得知马戛尔尼的拒绝，乾隆当然不快，随即发布诏书称：“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乾隆的诏书没有撒谎，在东亚地缘政治圈内，中国作为唯一的大国，它的皇帝向来被视为天下共主，理应受到其他国家使臣乃至国王的膜拜。然而，乾隆不可能明白的是，现在面对的不是那些必须依附于天朝才能生存的蕞尔小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生机勃勃的伟大国家。

不过，马戛尔尼不是来和乾隆抬杠的，得给双方台阶下，而不是